

# 六朝石刻辟邪艺术图像的释读

孙长初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6)

Bixie, the stone sculptures during Six Southern Dynasties,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and art from that time. The lion-shaped head, yawning mouth, out-extending tongue, wings inscribed on two sides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Bixie. Through tracing these elements' origi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Bixie is the result of Sino-west culture exchange and traditional burial custom.

Key Words Six Southern Dynasties Bixie Element Sino-west Culture Exchange

**内容提要** 六朝石刻辟邪是六朝时期文化和艺术的载体。六朝石刻辟邪的艺术图像的构型要素以狮形头、张口露舌、体侧刻划羽翼等为主要特色。通过对这些艺术要素源头的追溯,笔者认为:六朝石刻辟邪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中国传统丧葬礼俗的产物。

**关键词** 六朝 石刻辟邪 构型要素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877.4

**文献标识码** A

六朝石刻辟邪主要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的句容、丹阳等地,屹立于南朝皇室、贵族陵墓前。它们是六朝时期石刻艺术的典范,其魁伟高大的造型,引人入胜的神态,融多种动物形象于一体的艺术创作组合,令人遐思。

有关六朝石刻辟邪,古今中外的学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从历史、文化、艺术等角度展开了研究。朱偕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可能是最早对六朝石刻辟邪进行考证的著作。朱希祖的《天禄辟邪考》从文献记载出发,对六朝石刻神兽的称谓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六朝石刻辟邪的镇墓、避邪之功用被普遍认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针对石刻辟邪的原型、石刻辟邪的创作背景、丧葬功用的被认识等诸多深层次的研究与思考还有欠缺。本文将立足于对六朝石刻辟邪艺术图像的剖析,运用田野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资料的实证,释读隐含于六朝石刻辟邪艺术图像深处的中国古代神异动物形象的创作方法及其文化意义。

目前,保存在六朝陵墓前的石刻有31处,其中帝王陵墓前12处,王侯墓前19处,往往由石兽、石

柱和石碑组合。帝陵与王侯墓前的石兽略有区别:皇帝墓前的石兽带角,有双角和单角之分,称天禄(鹿)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sup>[1]</sup>。其形象均为狮形,麒麟和天禄形体较为秀美,辟邪则较为丰满。考古发掘资料和古文献资料都证实,辟邪最早出现于两汉时期,质地有玉、石、铜、陶等。石辟邪形体高大,往往被置于陵墓前。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记载,汉宗资墓在邓州南阳界中,墓前有二石兽,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河南孟津油坊街村和许昌市出土有东汉石辟邪。玉、陶、铜质的辟邪,形体较小,是墓室中的陪葬品。陕西咸阳西汉渭陵遗址和陕西宝鸡市北郊一东汉墓葬中均出土了玉辟邪,陕西西安范南村和十里铺出土有陶辟邪,1967年8月安徽阜阳城南刘家坟1号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辟邪。西晋时期的辟邪形象常见于南方青瓷器中,因背部有一管状圆柱,似可插蜡烛照明,被称为狮形烛台。浙江余姚长丰毛竹山出土的青瓷辟邪<sup>[2]</sup>,其整体造型与汉代辟邪无异。因此,从两汉时期的玉、石、陶、铜等质地的辟邪,西晋时期的青瓷辟邪,直到南朝时期形体庞大的石刻辟邪,尽管形制大小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但其狮形头、张口露舌、体侧刻划羽翼等构型要素,以及专用于墓葬的功用并未发生改变。

## 一

对六朝石刻辟邪艺术图像的释读,必须追溯其源,才能得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辟邪的头部似狮子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汉代以前,凶猛的狮子不见于中国。根据古文献记载,狮子原产于西亚诸国。《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国(波斯)有桃拔、师子”。师子是中国古代“狮子”的别称。西汉武帝开通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以后,中国与中亚、西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狮子也正是在此时被作为西域国家的特产贡献给汉王朝的。《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后汉书·和帝纪》:“章和二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后汉书·班超传》:“月氏贡符拔师子”。狮子是动物世界的“百兽之王”,威武凶猛,稀有而珍贵。西域诸国频繁地将本国的狮子不远万里送到长安,意在博取汉室朝廷的喜欢,汉代的统治者对这一外来的供奉物产,更是珍爱有加,并作为重大的事件屡屡载入史册。如此,从汉代开始,活生生的狮子被中国人认识,并受到统治者的偏爱而成为艺术表现的题材。

辟邪的另一特征是张口露舌、长舌垂胸。有研究者认为,长舌是胡须,现实生活中,只有胡须能达到这样的长度。按照人类造神活动的规律,动物神必须具有动物的原型,兼具夸张某些部位,视所要表现的文化含义而有所选择。为丧葬而创作的辟邪,以满足驱邪避害、保逝者平安为目的。战国时期南方楚国曾经普遍流行的漆镇墓兽的造型要素,成为辟邪艺术品创作的借鉴。漆镇墓兽主要出土于河南、湖北、湖南三地的战国楚墓,尤以湖北江陵原楚国都城附近的战国墓葬中多见。据不完全统计,战国楚墓出土的漆镇墓兽约有200件,以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的为多,见于大墓或较大的墓中,往往一墓一个,一般置于墓室的头箱里面。镇墓兽大都是木胎雕刻,髹漆或加彩绘,一般由方形器座、兽身、鹿角三部分拼接而成。湖北江陵雨台山2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镇墓兽,由座、身两部分组成,身座分别雕成,兽身插在底座上;兽单头,面作长方形,长舌,曲颈;眉、目彩绘,通身涂黑,上绘卷云纹和菱形纹,顶部有两个插角的方孔<sup>[3]</sup>。漆镇墓兽最显著的图像特征是方形器座和以凸

眼、口吐长舌为标志的兽面以及高耸多叉的天然鹿角。辟邪与镇墓兽在艺术创作的目的和功用方面是一致的,都是作为丧葬用具在葬俗中起避邪驱害的作用。那么,辟邪艺术品的创作,从战国楚墓流行的漆镇墓兽形象中,抽取最具特色的垂胸的长舌作为一个重要元素,似也存在较大的可能性。

辟邪身体两侧刻划有羽翼。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造型艺术品中,很少发现有带羽翼的兽类造型,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两件错银双翼神兽似为特例,兽头,尾似狮非狮,作昂首扭向一侧、张口咆哮之状,两肋生翼,摇曳欲飞,两翼修长,上饰长羽纹<sup>[4]</sup>。李学勤先生在对这两件器物的研究中,精辟地指出这些带羽翼的神兽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类似的神兽,极易在论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目录中找到,兽的特点是狮身鹰翼,有的头也是鹰的,称为‘格力芬’(griffin),另一些则为兽头。中山王墓的有翼神兽,和斯基泰的有些花纹相似”<sup>[5]</sup>。循着学者的思路,确然无误地在中亚、西亚诸国所创作的古代艺术品中找到了有翼兽的证据。如同狮子是外来王国的贡献之物,西亚波斯王朝的有翼兽造型的创作方法也随之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梁思成先生早年撰写的《中国雕塑史》,虽然其研究资料十分有限,但依然推断出:“考古艺术之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晓者,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sup>[6]</sup>。西亚波斯有翼兽造型对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影响,绝非局限于辟邪艺术品。三国西晋时期的南方青瓷器,除了青瓷狮形辟邪身上有羽翼纹,同时期的青瓷羊、虎子等动物造型的器具身、腹等部位都装饰有羽翼纹样。

## 二

通过对六朝石刻辟邪艺术品的主要构型要素追根溯源的分析,显而易见,六朝石刻辟邪成为了中外文化艺术相结合的新型艺术品的样式。

首先,对六朝辟邪艺术品创作的直接影响来自于西方。西汉王朝采用武力与外交并用的手段,打通了通往西亚的陆上交通线,在宣扬国力的同时从事商贸活动。“丝绸之路”不但让众多的内地物品如丝绸、漆器等远输西方,也让中亚、西亚的

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以及大夏的石榴、大宛的葡萄、苜蓿、芝麻、安息胡桃等植物相继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狮子作为中亚、西亚诸国派往中国的使节带来的重要礼物之一，应该如虎、狼、熊、黑、汗血马等动物一样被豢养在皇家的园苑中。《淮南子·主术》中就记载了当时帝王苑囿中畜养有这些动物：“人主……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塘、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sup>[7]</sup>。然而，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下，肯定无缘目睹狮子的真实面目，充其量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靠着丰富的想象，创作着似狮非狮的辟邪，其技艺师徒相传。曾经有一位在农村打了一辈子石狮子的石匠，有机会到动物园见到狮子，发出了“我打的狮子与现实中的狮子不一样”的惊叹。在汉代，被称为辟邪的玉、石、陶、铜为质地的神异动物形象尚未有统一的造型，狮形辟邪形制的最终确立无疑要到南朝时期。

六朝石刻辟邪无一例外地装饰有羽翼纹样。根据滕固先生对六朝石刻辟邪羽翼纹样的分类，可以有五种：“(1)短翼耳翼膊有鳞纹的——如宋武帝及陈文帝陵上的石兽。(2)短翼翼膊作涡纹而腹部复衬有羽翅纹的——如齐宣帝陵的石兽。(3)短翼翼膊有鳞纹而腹部复衬有羽翅纹的——如齐武帝及齐景帝陵的石兽。(4)四小翼拼成一大翼而腹部复衬有羽翅纹的——如齐明帝陵的石兽。(5)简单的短翼而翼膊作涡纹的——如梁武帝陵的石兽”<sup>[8]</sup>。这些在自然界并不生长羽毛的动物上装饰羽翼纹的传统，其源头在遥远的西亚的斯基泰人艺术，更可以推源到“古代迦勒底——亚述的装饰艺术”。这类艺术品主要在中国的新疆地区被发现，时代在公元前4至公元前2世纪，著名的有阿拉沟木椁墓出土的高方座承兽铜盘，通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鬃毛卷曲成穿孔，似翼<sup>[9]</sup>。此外，新疆伊犁心源县也出土有类似的承兽铜盘。这些有翼兽造型的神兽被誉为“斯基泰动物意匠”或“斯基泰风格”的艺术作品，从汉代开始频繁地出现于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中。不过，中国古代对带羽翼的神兽的艺术创作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艺术传统，而是经过符合中国古代人的审美特征的再创造。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两件错银双翼

神兽上的羽翼是形象生动的鸟羽，两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部分神兽的羽翼也依然是具象的羽毛，陕西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收藏有两件市郊汉代墓葬出土的陶翼兽，羽翼如同禽鸟的翅膀<sup>[10]</sup>。汉代以后神兽上的羽翼都用抽象的刻划羽毛纹替代。1985年江苏南京清凉山三国吴墓出土的青瓷羊尊，腹部刻划有羽翼纹<sup>[11]</sup>。至于狮形的带羽翼辟邪，考古出土资料则更多。西方的艺术因素，经过中国古代工匠人的消化吸收，由最初的照搬模仿，发展为符合中国人审美的艺术要素。以上事实说明，伴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艺术创作交流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为中国古代艺术品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六朝石刻辟邪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丧葬礼俗的产物。东汉明帝建立寝陵制度，将朝贺仪式搬到陵园，盖起祭殿、钟楼，树立石人警卫于陵前大道，设立象征吉祥和驱邪除魔的石雕神异动物，包括虎、马、牛、羊、象、骆驼和有“天禄”、“辟邪”之称的神兽，辟邪的丧葬功用昭然若揭。辟邪作为神兽，或被放置于墓室中，或威武地伫立在墓地上，不容置疑，其目的是对墓主人起保护和守卫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保护统治者安全的是强大的军队和被统治者信仰的天地之神，那么，按照时人的观念，人死后的灵魂世界就需要相当于现世的军队和神来保护，秦始皇陵周围就出现了庞大的兵马俑军阵。至于神的创造，就复杂多了，它与当时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有很大的关系。汉代的思想和文化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已经被学术界所公认，楚文化中深刻的原始巫术因素，给两汉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神秘的战国楚墓漆镇墓兽，专门用于丧葬的镇墓，辟邪创作的目的和用途与其不谋而合，是将镇墓神兽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因为在动物神的创作中，离不开作为母型的动物的自然属性，同时又要脱离原型的束缚，把它们的自然属性加以夸大、神异。战国楚墓的漆镇墓兽造型，已经没有了作为一脉相承的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纹和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但下垂及胸的长舌却令人震惊。凶猛威武的狮子恰在此时引人注目，得到皇室贵族的垂青，因此，以狮子为母型，给狮子配上恐怖的长舌头，在身上刻划羽翼，作为神兽艺术形象的辟邪便应运而生。日常

生活中所见的石雕狮子,是在辟邪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最先专门用于丧葬礼仪,为墓室和墓主人担当安全保卫职责,转而外延扩展到担当镇宅保家的角色,通常被立于大门左右两侧。

总之,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需要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消化与吸收,六朝石刻辟邪艺术品的成功创作树立了中西文化艺术交融的典范。在中国的传统丧葬礼俗背景下,特别是两汉时期厚葬成风的前提下,新的皇家贵族陵墓制度的确立,对大型陵墓雕塑品的需求,刺激了陈设石兽艺术品的创作。在其作为镇墓避邪功能不变的前提下,继承战国楚墓镇墓兽的基本要素,迎合皇室贵族对外来文化和艺术的情趣,选择曾经是西域各国贡献给汉帝国的重要礼物——狮子,取其凶猛威武的外形,特别是与众不同头部形象,进行艺术构思,将具有中国传统镇墓兽特征的长舌与具有中亚“斯基泰风格”的羽翼装饰,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成就了中国古代皇家贵族陵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第 344 页。
- [2]叶树望主编:《余姚文物图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2 年,第 216 页。
- [3]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雨台山 21 号战国楚墓》,《文物》1988 年第 5 期。
- [4]文物出版社编:《中国文物考古之美》卷六,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第 168 页。
- [5]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 [6]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第 52 页。
- [7]西汉·刘安等著、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491 页。
- [8]滕固:《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年,第 300~303 页。
- [9]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 年第 2 期。
- [10]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瑰宝——陕西新发现文物精华》,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74、114 页。
- [11]徐湖平主编:《江苏馆藏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 2000 年,第 61 页。

## 《东南文化》2008 年征订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 年创刊,二十多年来已办 200 余期,深受海内外文化界、学术界、收藏界的推崇,被录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东南文化》坚持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发表新史料和考古新发现为主体、以物质文化史论为主线,定位独到,特色鲜明。主要栏目有: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史论、艺术史论、中外文化交流、文物研究等,图文并茂、印刷精美。

本刊为大 16 开本,96 页。全年 6 期。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 28-236。全年订费 165.00 元(含邮资),国外订户每年订费为 120 美元(单价 20 美元)。凡读者直接向编辑部订购

(包括补订、破期订、零售、配套等),可获书价 8 折优惠,国内邮费为书价的 10%。我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即发杂志。

通信地址 南京市中山东路 321 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  
联系人 何刚  
邮政编码 210016  
电话 (025)84806201  
E-mail: dnwh@chinajournal.net.cn  
本刊开户行 南京市建设银行明故宫分理处  
帐号 32001594156050000412  
单位 东南文化杂志社

《东南文化》编辑部  
2008 年 3 月